试论两种根本对立的“扬弃”

——重温马克思关于股份制的思想

温 端 云

本文核心问题是以马克思关于股份制的思想,尤其是股份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及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的理论,与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有人试图以股份制去实现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的论点进行对照,指出后者与前者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扬弃”。文章围绕两种对立的“扬弃”从三部分展开论述:一、股份制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对资本主义私人产业的扬弃;二、在社会主义体系中,股份制不能成为对公有制的扬弃;三、股份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应有一个适度发展的环境。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股份制作作为所有制改革的思路与途径之一早被提出来了,理论界也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从1984年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起,我国股份制经营形式从试点到逐步推广,已扩散到国内许多省市,尤其在经济特区与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因而股份制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但是,人们对股份制的关注仍然抱有不同的主张与目的,在各种主张与目的背后,实际反映着对股份制不同的理解,以及对实行股份制所产生效应的不同追求。

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股份制时这样说过:“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①现在有些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股份化的人则认为,要解决社会主义国有资产所有权主体虚化的矛盾,只有通过股份制使“国家财产权民事化”^②。这就是说,通过股份制度以实现在社会主义体系的基础上对公有制的“扬弃”。我将这两种“扬弃”看作是根本对立的。

一、股份制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对资本主义私人产业的扬弃

从当代历史的继承性来看,人们都把股份制看作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其实,真正考察股份

制的萌芽与产生,它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产物。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就出现了类似股份公司的经营形式,如当时的“船夫行会”。它们主要被雇于运输粮食,并与资本雄厚的商社相勾结,那些被禁止经商的罗马元老往往是这些公司的匿名股东。当然,这种公司作为股份制来说还不规范,只能说是股份制的萌芽形式。

从股份制的萌芽形式来看,首先它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无须通过股票集资的方式去组织大规模的生产与经营,通过股票进行集资建立股份公司,只能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并有广泛的市场为条件时才有必要。

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而且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在它的发展中享用了商品经济为它提供的所有形式(包括股份制在内),但是,以私人资本所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本身,并不直接要求以股份集资的方式进行经营。相反,它最初的典型形式却是以单个资本家独资经营为起点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却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形式,因此,产生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股份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日趋完善。

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中盛行的海外贸易是极富有掠夺性的,它必然遭到被掠夺地区人民的反抗,并引起贸易参与伙伴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战争,加之海盗盛行,风险性大,如果资金缺少人力单薄是无法经营的,由此而产生垄断性的股份经营企业,垄断公司成为资本积累的有力手段。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竞争促进了资本的集中,这种集中不论是以“大鱼吃小鱼”的方式,将众多的小资本聚集在一个资本家手中,或是中小资本相互联合以集资入股的方式,这都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和资本积累的必然趋势。在竞争的压力下,没有相对巨大的资本是不可能生存的。马克思说:“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⑧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开展也加速了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发展,马克思说:“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⑨可见,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由于竞争与信用这两个有力杠杆的作用,股份制作为一种集资的主要形式,就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股份制在银行、保险、交通运输等行业中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资本主义发展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资本集中达到了高潮,股份公司在各经济部门与产业中都占据了统治地位,尤其是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工业由轻向重的转化,新兴工业部门出现,更迫切需要股份公司的的发展,并在资本集中基础上引起垄断,从而出现了洛克菲勒、摩根、福特等大财团。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制造业的产品90%是由股份公司制造的,各公司直接控制了全国财富的1/3以上。

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股份公司已经成为现代公司的典型形式,如1980年,美国企业构成中,股份公司有271万个,占私营企业总数的16%,而销售额的比重是88.9%。同时,股份制的法规,章程也越来越严格和完善,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制订了商法、公司法、证券法、投资法、投资咨询与保护法、税法和破产法……等等。

股份制在商品经济最高形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同时也显示了它在这种经济制度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最显著的作用是加速了资本积累与集中,兴办了在个别资本所有制下无法完成的事业与企业,马克思说:“如果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

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⑥

股份制在促进资本积累与集中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的另一重大作用，既是不可避免也是资本所有者始料不及的。即资本的大量集中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社会化进程，并由此加深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不可避免地引起对资本私有制本身的否定和扬弃。尤其是由股份制引起的社会化进程带有二重社会化性质：一是生产过程的社会化，这是由资本量增大、技术的改进更新、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提高、部门之间的联系与依赖加深而引起的；二是股份制企业的资本由多数股东分别占有又集中使用而形成的资本社会化过程。因此，生产与资本社会化的这种结果与其动因必然形成尖锐的矛盾：资本量的增加与集中本意是为了加强剥削，巩固与强化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统治；而且资本主义股份制也是为了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所有制形式上的一种调整。可是其结果却是与私有制相对立的生产和资本的社会化。马克思说：“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⑦所以，马克思是将股份制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私有财产转化为直接的社会财产的“过渡点”，当然，这是在资本主义的限度内所有制关系的一种调整或转化，但其转化的方向与性质正与马克思在论证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所得出的结果相一致：“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⑧

当然，问题并不会那末简单，过程也不会是顺利的，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集中过程以及股份制对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产生的效应和结果并不是无条件的，因为，“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⑨“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的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⑩所谓消极的扬弃也就是马克思紧接着讲的：“这一制度中包含的资本所有权的潜在的扬弃”^⑪从马克思以上论述可以说明两点：一、股份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是一种由分散的、独立的单个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联合的资本共同占有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这本身就是对单个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否定，所建立的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社会占有形式。二、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借助于股份制达到完全否定资本主义所有制，或者真正改变资本占有关系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共同占有制，因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制企业仍然是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形式，从企业内部关系来说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企业内部是以加强剥削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机制。从其外部条件来说，有资产阶级政府为其资本所有制进行各方面的保护。因此，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对私人资本产业的“扬弃”是有局限性的，人们更不能企盼通过这种形式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必需以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为前提去实现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真正扬弃。不过，从这里我们起码可以断定，马克思对股份制在历史转变中的作用及其扬弃的方向，是从“私”或“资”到社会共同占有，而不是相反。我之所以特别着重指出这种“扬弃”的方向问题，这是与下面所论述的问题相关的。

二、在社会主义体系中，股份制不能成为对公有制的“扬弃”

我国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已为股份制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由于股份制

是以发行股票进行集资的一种经营形式,一般来说,它的经营规模比较大,如果不是有广阔的市场和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是不能容纳下较大规模的生产和经营企业存在的;它需要从众多的分散的货币所有者手中收集资金,向他们出售股票,这就要求有较发达的商品、货币关系;以股票形式入股不能中途退出投资者的资金,也就有必要让股票这种有价证券能在市场进行流通,它就必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金融体系和市场体系,等等。因此,股份制的存在、发展,离不开发达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

我国近十多年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改革”“开放”为基本点的正确方针指引下,不仅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而且市场经济已逐步完善和成熟,我们有较完备的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市场,资金和金融市场、技术与信息市场、人才与劳务市场;有比较齐全的、结构合理的产业部门和各种所有制同时并存的商品经济实体;有进行宏观调控的各级计划、财政、金融、工商行政管理体系;也有逐步建立起来的经济法规章程制度;在各类企业内部也逐步建立了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等。尤其在市场经济和经济改革的大潮中,人们都增强了商品、市场经济观念,培养了经济实际操作的能力,大部分人的个人收入都有所提高。以上这些都能成为在我国推行股份制的必要条件。

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人们也都普遍认识到我国传统的所有制结构模式加上它的一整套管理体制,已不完全适应商品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与发展了。因此,所有制形式和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势在必行。

所有制改革以什么模式朝着什么方向进行?这是理论与实践中的必需首先解决的问题。所有制改革的突破口首先在农村,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核心所进行的改革取得了成功。人们也从这种改革中逐渐领悟到一个十分有益的启示,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适当分离不失为建立与完善企业经营机制的一个方向。因此,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的改革,也就从“两权分离”的思路入手,于是提出并实行了以租赁制、承包制、股份制等经营形式作为改革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的模式。但是,在改革的实践中,租赁制、承包制比较容易推行和被接受,见效也快。因为这两种形式的推行涉及面相对有限,主要是国家同企业和企业内部在经济利益和权力关系上的调整和改变。而股份制则是一个涉及面宽、比较生疏,而操作又比较复杂的问题,尤其对商品与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要求更高。所以,在实践中,人们对股份制的推行抱着较为谨慎的态度是妥当的,在理论上形成不同的观点是正常的,在思想上产生各种疑虑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理论上来看在诸多不同观点中,我特别关注的是推行股份制所要达到的目的及其结果,或者说人们想把股份制引导到何方?就这点来说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目标:一种把股份制作作为公有制可以采纳的经营形式之一,是基于传统体制的弊端,在维护、增强公有制经济的前提下,通过股份制改善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调整内外部关系,充分发挥股份制在筹集资金方面的作用,更大范围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为最终目的;另外一种则认为过去改革的所有形式都“未触动传统体制的企业制度”,而国营经济“所有权关系不清和财产权形式单一,构成企业封闭化的直接原因。”^①为了解决“国有资产所有权主体虚化的矛盾”只有推行股份制,使“国家财产完全民事化”^②(着重点是作者加的)什么叫“民事化”?说穿了就是私有化。作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包括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在内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但如果是将所有的国营经济都通过股份制去实现全面的私人所有制,这与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与我们进行所有制改革的初衷是相悖的,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完全扬弃!

我们主张推行的股份制不应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扬弃,而是一种对社会主义公

有制的补充与完善。

三、股份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应有一个适度发展的环境

股份制这种曾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经营形式,现在将它移植在社会主义经济土壤中,是否也能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有人试图从股份制的姓氏家族即姓“资”或姓“社”去论证它是否能为社会主义所用。这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把它作为一种经营形式来说,它既可姓“资”也可姓“社”。股份制的属性可以包含二重理解:一是就股份制所采取的集资和经营形式来说,它不反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属性。有人说,股份制属于“中”性,也只能从这点去理解;二是就投资者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及其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与物质利益关系来说,这才具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属性,它既可以姓“资”也可以姓“社”。

正是由于股份制的经营形式本身不带固有属性,所以可以被资本主义利用,也可以被社会主义所接纳,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条件下,股份制既可以被各种经济成分分别接纳,分别成为各种经济成分的经营形式,也可以由各种经济成分共同接纳,使各种经济成分在企业内部进行联合。因此,我国现阶段的股份制企业也体现着各种经济成分和不同所有制性质:当它是由全民所有制不同企业认股共同投资时,它无疑是一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即使其中含有职工个人入股的成分,也不会影响其基本性质);当它是由集体所有制企业与劳动者共同认股投资时,它就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当它是由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或外商资产者认股投资时,它就是资本主义私人企业或中外合资,外商合资的企业;如果以上各种所有制共同认股投资时,这种股份制就是混合的所有制企业。

我们已越来越认识到,股份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集资的最好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吸引外资更为合理,当然外资优于内资的突出点是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可以引进国内紧缺物资和技术。况且,目前国内居民储蓄已达万亿元以上,个人认股集资的条件也初步具备;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物价呈上涨趋势,医疗、住房等体制改革的形势下,人们也在思考,如何使有限的货币收入有所增殖,因而萌发了认购股票的强烈要求。

股份制在企业或行业之间进行募股集资,有利于生产要素在企业或行业之间进行转移,从而充分发挥各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并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

股份制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对分离的一种较好的经营形式,因此借助于这种形式可以解决在传统体制下企业经营机制不健全、责权利关系不明确的弊病;由于它多渠道的集资方式,从而带有一定成份的“民众化”与“联合化”特色,这就有利于摆脱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干预,保持作为商品经济实体的相对独立性。

股份制不仅是众多投资者的集体集资,而且投资者的权益大小与其掌握股票的份额相联系,这就形成了一个“责任共负、风险共担”的相互制约机制,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如果在允许企业职工也认购本企业股票的条件下,更有利于提高职工的“主人翁”意识。

由此可见,股份制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是可以扎根,生长、开花结果的,是我们在所有制改革中可以采纳的形式之一。

但是,将这种曾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股份制经营形式,移植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土壤中,也要防止它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例如:股票的发行与上市很容易引发人们的投机心理与投机行为,对社会经济秩序带来一

些混乱；股票轮番倒卖股价上涨，任意扩大了实际资本与虚拟资本的差距，导致虚拟资金的膨胀和虚假的社会需求，不能真实反映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发展状况，必然会增加宏观经济管理的难度；有些人朝思暮想去发财，使有些在职或在读的人因此而影响工作、学习和生活；更有甚者投机份子钻法规不健全的空子制造混乱，扰乱市场；有些企业不顾本企业的经营条件与管理水平盲目发行股票，损害股票持有者的利益；或者弄虚作假不遵守法规、不公布企业财务状况愚弄股东；或以发行企业内部股为名私分国家财产等等。

总之，因为股份制在集资和资金转移上的特点，更由于起始阶段各种条件的不完备，使股份制像一匹野马不好驾驭。这些都是我们在推行股份制时应该看到的问题。

在推行股份制的高潮中，要让股份制形式在经济发展中健康而有效地运用，是需要有一定条件的。就企业来说，它要求企业有健全和科学的管理制度；有严格而规范的运行操作机制和手段；企业的职工尤其是管理者要具有较好的素质；企业在过去的经营中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经验，或在今后的市场竞争中具有较强的实力。就宏观经济角度看，要造就一个使股份制得到适度发展的环境；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和健全各类市场尤其是仍然十分薄弱的金融市场；迅速改变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要给各种商品经济实体充分享有自主权，提高它们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及时转换政府职能，而这种转换不是凭借自己的权力去取代经济部门与企业的职能，而是发挥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引导与宏观调控职能，有效地为市场、为各经济实体服务；要很好地驾驭股份制这匹“野马”，更需要国家的政权与法制部门及早地制定和完善有关章程、制度和法规，无论是推行股份制的企业本身或广大投资入股者，乃至所有市场经济的参与者，都迫切仰仗于国家颁布的法规与制度去保障他们的合法利益和正常的市场秩序。

从国家的全局利益考虑，对股份制的推行还要考虑到各地区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时序差别，因为股份制必需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成熟程度相适应。但是就全国几个大城市来说，虽说发展程度上有差异，但作为推行股份制的条件已基本具备，这就没有必要在推行股份制的步骤上时序拉得太大，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地区之间的封闭已经被冲开，如果人为地设置障碍，阻止股份制的推进也就很困难了，其结果反而会制造混乱，不利于地区间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与发展。

股份制如果是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和企业中推行，希望它仍然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框架内发展，和一切其它经营形式和所有制形式一样，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助手与补充。马克思曾经论证过的，股份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度内，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是“潜在的”或“消极的”，那末，它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应该有可能真正完成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这种扬弃却是现实的、积极的。当然，这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注 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页。

② 《光明日报》1987年10月24日。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9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7页。

⑨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

⑪⑫ 《光明日报》1987年10月24日。

（本文责任编辑 邹惠卿）